



我们需要怎样的社区治理



杨兆顺“返场”投入社区抗疫。



在任桃浦十村“村长”时期，杨兆顺经常和居民拉家常。摄影/楼元彪



上世纪90年代走过苏州河畔即将拆迁的棚户区的孩子。摄影/陆元敏

今年90多岁的孙玉珍是28岁的时候进入武康居委会工作的，后来还担任过居民区书记。她回忆，当年居委工作主要是围绕宣传、治保、调解和卫生而展开的，居委干部大多是尽一份义务。段炼告诉记者：“到了上世纪90年代，情况发生了变化。一方面，国企下岗大潮之下，不少下岗工人需要找工作；另一方面，改革开放之下，学习国外的一些经验，‘社区工作者’的概念逐步引入。”

杨兆顺称，在他的理解，上海居委会的工作人员，从里弄干部、居委干部，逐步过渡到社区工作者阶段，大约是在1999年前后。“当时，下岗工人多，确实充实了社区工作者队伍。另一方面，随着社会的进步，‘企业人’渐渐都成了‘社会人’，原本家里有困难的职工会去找企业，这时候老百姓就只能找到居委会。”杨兆顺说，“居委干部某些方面的权力又增大了。譬如认定这家人家可以拿帮困卡，那家人家还没有到领取帮困卡这样困难的地步。”随着老一代曾经的“3860部队”退休，

甚至杨兆顺这一代“50后”已经退休，“60后”正进入退休年龄，如今迈入社区工作者行列的是更有学历的年轻人。

社工更大的价值正在体现

“社工可以考取社工证。不过，据我了解，目前并没有要求所有的社工都考取社工师职称。但是我们鼓励大家去考取职称，如果持有社工师职称，可以在原有的工资水平上提高一档或两档。”杨兆顺说。目前，依托“杨兆顺工作室”，他还在为基层社区做“传帮带”工作，也曾面试过一些要求加入社工队伍的年轻人。他们中有人学历还挺高，连研究生毕业的都有。“有一次桃浦镇招聘30个社工，有600人报名。看这架势、录取比，简直比进中央党校还难。”杨兆顺说。社区工作，事无巨细，又没有高收入。这些高学历者为什么要加入进来呢？难